

中华上下五千年(九)

清史

(八)

余东亮 主编

目 录

派遣幼童出洋留学	员
海军耆英詹天佑	源
最早留学生的不幸遭遇	远
早期改良思潮	怨
言行脱节的郑观应	源
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愿
李鸿章建淮军	圆
北洋海军	圆
南昌教案	缘
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苑
阿古柏入侵新疆	猿
左宗棠首战乌鲁木齐	猿
黄田初战告捷	猿
古牧地歼灭战	猿
攻克乌鲁木齐	猿
玛纳斯南城攻坚战	猿
索回伊犁	源
左宗棠进驻哈密	源
伊犁回归祖国	源
堆拉之战	源
江孜保卫战	源
康玛沿线之战	源

卡罗拉之战	源
西藏军民袭击江孜	源
英军重占江孜	源
拉萨城下订约	源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源
天津教案	源
再来一个儿皇帝	源
左宗棠“昇栳出关”	源
金积堡之战	源
河州之战	源
西宁之战	源
肃州之战	源
郭嵩焘出使铩羽而归	源
官办工业腐败大暴露	源
海防与塞防之争	源
马嘉理事件	源
海防大臣视战争如儿戏	源
前方奏捷后方求和	源
中法首战山西	源
北宁战役	源
中法观音桥事件	源
中法基隆保卫战	源
马尾海战	源
中法船头、郎甲之战	源
临洮大捷	源
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	源

骠勇巴图鲁刘铭传	员源
诚惶诚恐的光绪生父	员源
奕 玟 一生经历细账	员源
慈禧两代操纵利用	员源
光绪帝的悲剧预兆	员缘
黑旗军抗法	员愿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员员
康有为《大同书》	员源
撤帘—训政—归政	员苑
颐养天年，“昆明换渤海”	员愿
粉侯辱御史	员园



派遣幼童出洋留学

六十年代末，日本出现了一股走向世界的热流，上层人物纷纷出洋考察，一般青年学生前往欧美留学。这个消息，引起我国少数清醒人物的注意。首先是容闳，这个士大夫阶层中唯一的留美学生，不断向丁日昌和曾国藩反映和建议。同时美国驻华使馆在作长远打算：“那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它将在精神和商务影响上取回更大的收获”，于是热心地从旁策动，愿意尽可能提供方便。清廷随即批准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为什么派遣幼童？因为当时的青少年只读四书五经，年龄大些的要从头学习外语和数理是较困难的。

日本的情况则不同，幕府统治的黑暗与残暴虽然并不亚于清廷，可是它敌视西学实行海禁却没有清廷那末认真，因此，青年们有机会冒险秘密出国，例如井上馨十四岁到英国学艺徒，边工边读，十年而归。伊藤博文年轻时到英国，后来因为感觉到“即使我们个人学识丰富了，国家灭亡了又有何用”，提前归国了。加之，幕府时期某些藩立学校已经开始削减儒教教育的比重，代之以西方军事学和有利于作育人才的“实学”，读外语的人也多起来。有此基础，明治元年海外留学生虽仅五十人，不到几年就成倍成十倍地增加了起来。清廷的闭塞程度远过于日本幕府，直到咸丰年间，一般还认为读洋文是受人耻笑的事情，所以筹办留学事，一举步就感到艰难。计划规定幼童年龄为十三岁到十五岁，因为到了国外几乎要从小学读起，所以学程规定为十五年。分四批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的末年，中国开始走向世界。

出国，每年每批三十人。就时间上说，这是个太“长远”的计划；就数量上看，正如“杯水车薪”，是救不了急的。

虽然如此，也还是阻力重重，上层百般刁难，社会上反应麻木。同治十年夏，上海的预备学校贴榜招生，竟是门庭冷落。当时人们都有“安土重迁”观念，放子弟们少小离家，中年才回来，是件了不起的犯难事。江苏省算是比较开通些，报名者不过三名（其中上海、川沙儿童各一名），内地更不用说了。容闳发了急，赶回香山，动员家乡子弟；又到香港，在港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了几个，这才凑足名额，第一批三十人在翌年出国。留学监督的负责人，正手是不通外文但属正途出身的翰林员陈兰彬，一手经办的容闳则充他的副手。到光绪元年止，四批出国完毕，学生中“北人应者极少，来者多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一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这件事情，前前后后遭到不少的非议和责难，从此草草收场。十年后，因美国反脸变卦，国内又是一片反对声，学员仅少数读完学程，大多数半途而废，提前返国。

再看看同一时期日本的做法是怎样的。

明治维新那年的留学生仅五十人，第二年增至一百五十人，第五年超出了一千人。他们后来感到这样增加下去，所费不赀，不是个办法，于是重金礼聘西人来到日本当教师。明治六、七年间，各官署所聘与府县所招的外籍教师，统计不下五、六百人；这样，并没有出国的“留学生”，至少也得有几千人了。造成这样的蓬勃气象不是没有原因的。

明治维新第一届的领导班子里，就有好几位曾经出过国的人，他们在同僚中不是受到排斥或歧视，而是得到了推崇



和尊重。天皇五条誓文反映了他们的意志和抱负，特别是第五条“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成为朝廷共同一致的认识。

维新前“攘夷论”在日本一度很顽强。这个“攘夷论”照字面看似乎是为要抵抗侵略，实质上是要求继续闭关自守，排除来自西方的科学新知，就象中国的穆彰阿、耆英，以及后来奉慈禧太后为中心的顽固派所固执的盲目排外思想，大同小异，它五十年代在日本很流行。伊藤博文原来也曾相信过这个道道儿，到了英国，见过世面，开始感到“攘夷”是轻率的，进而认识到它足以招致亡国之祸，所以立即辍学返国，鼓吹开放。维新政权巩固以后，当权派更加感到不足，明治四年派出了一个庞大使团，走遍西欧、北美，在“求知于世界”方面获得了意义深远的丰收。

这个使团由最高领导阶层的人物组成，他们在百废待举的新情况下感到不足，渴望向先进的西方学习。例如大久保利通是个能人，维新后在“殖产兴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可是出国以后，仔细观察了英国的工厂、道路、铁路和运河等工程，赞叹之余，痛感日本差距很大，自己才力不足，对同僚们说：“象我这样年近半百的人，今后已经无能为力，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只有引退了。”他学到了很多東西，回国后又继续学习不倦，作出了许多贡献。

这个使团还有更多的壮年人。除团长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已四十多岁外，其他木户孝允、山县友朋只有三十来岁，伊藤博文年龄最轻，刚三十岁。

木户孝允看到欧洲教育事业的发达，在旅程中，就驰书国内告诉他的同僚们：“吾人今日之开化，并非真正之开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的末年，中国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变革。

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于兴办真正之学校。……确立牢不可破的国基唯在于人；期望人才相继无穷，唯在于教育。”

考察团还没有回国，日本政府根据他们旅途中的报告，随时逐项着手改革。就文教方面来说，撤消了神祇省，新设教部省；福泽谕吉发表《劝学篇》，文部省按其精神颁布《学制》；工部省设立六年学制的土木、机械、建筑、电信、化学、冶金、矿山等七种工学校，这都是明治五、六年间的事。报纸上经常发表考察团的见闻，发生了强烈反响。明治五年，出国留学高级学校的一百二十人，其中很大比例是高级官吏，他们倒是“仕而优则学”的实行家。

中国待到光绪二年（相当明治九年）李鸿章派淮军将士卞长胜等七人到德国学习水师军械技艺，福州船政学堂派少数学生赴法学习海军和造船，清廷还不懂得“教育”是何等样事。而即使是舍本逐末，专为船坚炮利而派人留学，也仅是天女散花式的。

海军耆英詹天佑

中国工程界前辈詹天佑，在铁路建设上所获得的惊人成绩，驰名国内外，只是他作为海军耆英，无论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源》，或是有关他的传记与碑文，都说得不够详细。

詹天佑游历美国时，年仅 16 岁，那是清朝同治十一年，那时刚开始公派留学生出洋。詹天佑先在康州的威士哈芬小学肄业，毕业后升到纽海芬中学，到了光绪四年戊寅（1878 年），入耶鲁大学工学院，学习土木及铁路工程，1882 年获得土木工科学士学位，本可继续深造，无奈因其他同学过于



西化，剪了辮子或皈依耶穌教，激怒了駐美留學生監督人員，向清廷告發。就在這一年，他們被全部撤回。

清廷把留美學生全數撤回後，不問學業如何，一律分別派往海軍或路礦學堂繼續學習。詹天佑雖然是仅有的兩名大學畢業生之一，然而因為當時路政未興，而他年紀也只有圓歲，便被派到海軍學堂改習駕駛。由於他有基礎，便算是“插班”性質；肄業年餘，即以第一名修院，成為光緒九年後學堂第八屆畢業生。那時船政大臣何如璋，以他學習努力，技藝優秀，特賞給他五品頂戴；同年十一月，分配到楊武軍艦任操練，並兼後學堂教習英文及駕駛。

那時中國海軍，以李鴻章為直督兼北洋大臣，曾國荃為江督兼南洋大臣，都有艦船十餘艘，各歸節制，不相統屬。福建則有揚武、萬年清、元海、琛航、永保、振威、伏波、飛雲、濟安、福勝、建勝各船，那時，也分撥到浙、粵、台灣各處巡航。光緒十年甲申，法國侵略越南，向中國尋衅。圓月，清軍失利，源月議和；閏緣月，法軍又挑衅，經清駐軍還擊，法軍大敗。遠月，法國向清廷索賠，清廷不同意，戰事又開。法軍在進攻台灣基隆時，遭到劉銘傳奮力還擊。法軍將領孤拔便转移到閩粵沿海等處肆意騷擾。孤拔帶領五艘軍艦、二艘水雷船，駛抵馬尾，企圖炸毀中國船廠。按照萬國公法，外國兵船入駐不得超過兩艘，停泊限兩個星期。原本可以据此與法軍交涉，但總督何璟怕惹麻煩，僅要將軍穆圖善鎮守長門，以張成為閩安鎮副將，兼帶楊武軍艦。這艘軍艦就是詹天佑所服務的“揚武”號，本是營務處的旗艦，統有 貳艘兵艦，可當時，僅有 苑艘兵艦及福勝、建勝兩艘炮船，其它的有的在船塢待修，有的被外調。苑月初二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韵部内裁繁简字归隸字部四隸

这一天，孤拔向张成递交战书。张成把战书转上何璟，何却秘而不宣。初三的早晨，法舰便开炮了。战事开始后，在罗兴塔上游的法舰，盯住了扬武号，施放水雷攻击。扬武号被击中船底，船身倾斜。张成乘小筏逃跑，福兴舰及福胜、建胜两艘炮船见状驰援；建胜开了一炮，正中孤拔座舰。在激烈的炮战中，清廷战舰除伏波、艺新两舰驶至林浦自沉以阻塞敌舰进出的航道，其余多被击沉。詹天佑置身扬武舰，激战中，他奋勇开炮，朝着孤拔座舰猛击，一直到扬武舰被水雷击中，仍然沉着应战；最后，接到弃船命令后，才跃身下水，还救援被难的同伙多人。从此，他便结束了海军生涯。然而，他的英勇事迹，足以激励海军后起而奋发。

最早留学生的不幸遭遇

我国最早的出国留学生之一容闳，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葡萄牙强租的澳门地方原是香山一个乡，香山人因与西洋人接触较多，风气比较开通，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各大通商口岸受洋商雇用的买办也有不少是香山人。

容闳少年时就读澳门马礼逊学堂。鸦片战争发生，英国侵略军强占香港，马礼逊创办者伦敦布道会把学校从澳迁港，课程全部按照西方国家模式，只多一门汉语。有几个英美商人为要培养殖民事业的得力人员，在学生中挑选比较聪明伶俐的，乐于出资给他们完成高等教育。三个孩童被看中，容闳即是其中之一。他们后来全被送到美国。因成绩优异，容闳又被送进耶鲁大学读了四年，曾两次获得英文作文奖金。容闳虽长期濡染教会影响，可是始终抱有为贫困落后

远



的祖国服务的志愿。二十七岁大学毕业，学校以较高的待遇要把他留下来，但他冒着“忘恩负义”的讥嘲，毅然回国。时在 1880 年，比日本较早的留学生之一伊藤博文从英伦归国早十年。另外两个，一个曾在后来的使馆担任秘书工作，西名阿龙；一个回到广州务医，名叫黄宽。

当时清廷根本不知道留学是怎么回事，更不懂得怎样来使用留学生。容闳先到香港，计划研究法律当律师，当地法界权威认为这不是中国人所该做的事，拒绝了他。他接触过未及赶上起义队伍而蛰居香港的洪仁玕，在忧国忧民这一点上，他们谈得很投机。他到达广州，正值叶名琛对红巾军起义进行大屠杀，遍地血腥，他满怀愤怒，悄然北上到上海。不料学无所用，四顾茫茫，经同乡人推荐，到宝顺洋行谋得了一只饭碗。他的工作是采购丝茶，根本用非所学。

当时产茶地带已陷入交战区域，李秀成攻下苏州后，容闳还曾经携带现银四万两，进入皖南太平地区采购一次，装了二十八条船运回上海。因他对这一带路途熟悉，当年冬天，有两个美国教士要进入天京探访情况，邀请他带路，一同经由苏、锡、常、丹内河西航，进入南京。

据容闳自传所记太平军区域的印象：丹阳地方“商不辍业，农不辍耕”，太平军对待人民的态度“甚为和平”。对比之下，他抨击了“官军之残暴”。

这时洪仁玕已经进入天京为干王，正在筹划新政。容闳找到他，他为旧友重逢而表示高兴。干王政务很忙，仍是招待客人住宿，并作长夜谈。干王要求客人提意见供他新政的采择，容闳提了七条建议。干王恳切地希望客人留下来帮助他工作，容闳要求干王保证七点建议立即付诸实践。干王表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的末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示要慢慢来，说明有许多困难。容闳没有接受干王给他的官职，告辞了。他后来在自传里说，“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他对干王的性格也不喜欢，说他作风非常硬性。干王送给一份随时可以重新进入天国的护照，容闳回到了上海。

容闳七点建议，有四点涉及或兼顾到教育的，如设立军事学校，设立海军学校，制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有两点是主张重视知识和人才的，如“组织健全的政府，聘请有经验的人才为各部门的顾问”；“培养有学识的军官”。这可能是了解到了天国一些实际情况后有感而发的。容闳重视培养人才和使用人才，这位喝过洋墨水的文哲专门家是务实的。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全神贯注于理想的经济建设蓝图，而容闳则着眼于作育人才，为振兴实业提供“人”的条件。他似乎比干王多看了一步，认为谋求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在教育，与后来日本明治维新施政的着眼点近似。可惜，在中国那个时代里，这样的人才在太平天国很难施展抱负，在清廷管辖下更只有当个买办的份儿。

比容闳年长四岁的唐景星也是香山人，在马利逊学校是容闳的高班同学。虽未出国，也受过高等教育，是个学业优异、做事精明强干的人。他比容闳早到上海，进了怡和洋行。香山人在沿海各埠当买办的着实不少，香山因此有“买办的故乡”之称。难道香山地方特别适宜于买办的产生吗？当然不是。香山地方风气开通，出了许多人才，只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这些人才都被埋没，或者被糟蹋了。



早期改良思潮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原来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发展成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

主要代表人物有：

王韬，字紫铨，号仲弢，江苏长洲（吴县）人。秀才出身，后屡试不中，离家赴上海受雇于英国教会主办的墨海书馆工作。曾因避清政府通缉，在英国领事庇护下逃往香港，后赴英、法、俄等国游学，悉心研究西方富国强兵之道。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评论时政，宣传“变法自强”。著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等。

薛恩，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贡生出身。曾当曾国藩幕僚八年，协助曾镇压过捻军起义。后随李鸿章办外交。光绪五年（**1879**年）著《筹洋刍议》，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光绪十四年（**1888**年）担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出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写了大量文章和日记，不断向国内介绍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国后，不久病逝。其著作经后人编为《庸庵全集》。

陈炽，字次亮，号瑤林馆主，江西瑞金人。举人出身，历任刻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等职。曾遍历沿海各埠及香港、澳门，留心“天下利病”，积极钻研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光绪十九年（**1893**年）发愤撰成《庸书》内外百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发表《续富国策》。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的咸丰年间，马建忠在天津创办了《马氏文通》。

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少年在上海时，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抛弃科举道路，专门研究西学。光绪二年（~~1876~~）年）赴法留学，兼驻法使馆翻译，得博士学位。他掌握拉丁、希腊、英、法等文，阅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回国后为李鸿章幕僚，累保道员。参与洋务活动。一度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晚年回家从事著述。其政治思想集中地反映在所著《适可斋纪言纪行》一书。又著《马氏文通》，亦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十七岁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曾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近二十年，并投资轮船公司。捐资得道员衔。同治元年（~~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同治十年（~~1871~~）年）又改名《易言》刊行。光绪六年（~~1880~~）年）后，由李鸿章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因受洋务派排斥和外国公司迫害，更注意研究时务。中法战争结束后，集中精力增补修改《易言》，光绪十九年（~~1893~~）年）定名《盛世危言》分五卷出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增订新编十四卷出版。

王韬与冯桂芬有过交往，思想受其某些影响。他看到“环而伺我者数十国”都是心腹之患，将来中国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表示“一息尚存，尚思报国”。马建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



惑我子民。”郑观应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梦寐不安，行愁坐叹”，“太息痛苦流涕”，“大声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见唐虞盛世”。薛福成主张通过修约取消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当听说洋务派准备推荐英国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军时，急忙上书李鸿章，说赫德为人“阴鸷而专利”，如再掌握兵权，就要“酿无穷之患”。在中法战争期间，他担任浙江绍台道，曾在镇海亲自参与击退法舰之战。此时，郑观应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曾只身入暹罗（泰国）、金边、西贡侦察敌情，在香港、厦门办理援台抗法事宜。反对李鸿章在上海议和。陈炽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国势危殆，更益坚其变法之志。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强学会，担任提调。光绪二十四年（~~1898~~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受到很大打击，经常“高歌痛哭”。次年竟在家乡忧愤中死去。

王韬建议“握利权”，使“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指责顽固派“动循古昔，不知变通”，认为“变古以通今者势也”。批评“重农而轻商”，提出“商为国本”、“富强即治之本”。主张“行泰西之法”，必须“先富而后强”，应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任、造轮船，大力发展新式商业。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官办不如民办”，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殫其力”，以推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早年曾反对“君民同治”，后来则转而认为“惟君民共治”，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晚年回上海主持格致书院，并任《申报》编纂主任，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人交往甚密，对洋务活动既献计又批评。

薛福成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处今日



中华上下五千年

在清朝的末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之世，“坏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故应“以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他称赞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认为西方国家“以工商立国”，“工实居商之先”；而西人恃商为命脉，商“握四民之纲”，又认为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但欧洲人口密度更高，因“能浚其生财之源”虽人满亦富。中国则要以导民生财和导民出洋，来解决人口问题。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工商实业，作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提倡私人集股成立公司，反对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提出“圣人正不讳言利”，“人人欲其私”等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论点。

陈炽认为西方国家的议院制度是“强兵富国”的根源，主张革命封建专制制度，实行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但又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观念，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之说。反对外国侵略者“盘踞要津”，攫取各种特权，认为“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农民起义是由于“户口加多而土地不加辟”，无以谋生所致，而不是民情好乱；只有发展机器工业才是出路。提出振兴“商务”以反对列强侵略的经济理论，即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各部门经济，“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在工”。谴责反对发展机器工业的顽固派是使中国贫弱的大罪人，揭露其口不言利的虚伪性。对洋务派的“摧折华商”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主张成立商部、制度商律、保护关税、取消厘金、设立公司、实行专利等保商措施。



马建忠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的“富民”思想。主张提高关税，“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以扩大商品出口。提出废除厘金、“将厘未尽行裁撤”，以利“华商”。主张发展新式工业，“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建议由“商人纤股设立公司”业，兴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介绍并倾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之政体，谓其“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所以要求对封建专制制度作某些改革，“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

郑观应批判顽固派泥古不化，甘心愚陋而受制于人；谴责洋务派“舍本图末”，对西方“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不能使国家富强。他认为“器由道出”，“道”由中国“列圣相传”，“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主张“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并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原则。还认为“外洋以商立国”，“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提出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的对策，而“十万豪商，胜于有百万之劲率”，此乃“一国兴亡之所系”。强调“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主张“以商战为主”，建立机器制造业。指出“官督商办”是“官夺商权”，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根本原因，要求清政府采取保护关税、海关不用洋人、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商人造铁路由国家保付利息、商人可举为议员及发给“称颂功牌”等护商措施。要求清政府提倡新学，培养新式人材，并组织力量翻译有关西方自然科学、工艺学、社会政治学等书